

湖北省人物志 传记

(试写本第四辑)

湖北省志·人物志编辑室编

1984·5

PDG

编印说明

一、为了做好省人物志的编纂工作，我们以试写本形式分辑编印传记部分，以便广泛征求意见，逐步积累成果，争取三五年内完成传记试写任务。我们期望，试写本的编印，将促进社会各方面对人物志作用和意义的认识，主动积极地担负起各自地区、战线、部门人物传记的写作任务。

二、人物收录时限、范围，暂定在一八四〇年以来，籍隶湖北或在湖北长期工作且有重要影响的外省及外国籍各类人物，而以推动社会前进的正面人物为主。在编排上暂按清末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军政人物和经济文化等其他人物这样三个方面，并就人物在历史上的地位作用，参照登上历史舞台的先后进行排列，不具有正式体例的意义。

三、在方志人物传记写作方面，我们试图以两三千字的篇幅来概括一个人物一生的主要方面，并体现人物的特色。实践是初步的，尚不具有“样品”的意义。

四、为了录以备用，我们在选用稿件时，标准稍微放宽了一点，因而，所收传记不都是在正式编纂时一定要采用的。

五、真实，是使历史记载传之久远、跻身于史册之林的基础。由于所录人物来自各个时期、各个社会领域，由于近现代社会变革发展的剧烈迅猛，在史料的完备和可靠性上存在着不足，请有关方面、学术团体、知情人士对本辑传记提出订正和补充意见。

六、撰写一篇概括人物一生及其主要言行的传记，是一件相当费时费力的工作。本辑所收传记，有不少是在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作者走遍大江南北，采访百十人次，历时数月、数年才得以

成稿，每字每句都凝结着作者、知情者、提供史料机构以及有关单位的共同劳动，在本辑编印之际，特一并致以谢忱。

七、限于能力和经验，本辑传记在体例、内容、文字以及编排上，错误在所不免，热情盼望有关方面、革命前辈、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湖北省志·人物志编辑室

目 录

刘子通	张双勤、董子儒(1)
昌绍先	吴德才(5)
李兆龙	夏福源、刘仲然(9)
庹万鹏	梅兴无(12)
朱勉之	武昌县志办(14)
段玉林	万建芳、简玉临(16)
张孝贵	胡振亚、何夫(19)
潘兆麟	兴山县委党史办(21)
赵英	李道兰(23)
柳直荀	万建芳(26)
叶金坡	周法浩、范晓林(29)
潘文郁	李道兰(34)
范家五虎	祝峰、杨尚成(38)
金华龙	吴德才(41)
黄春庭	白明东、吴德才(43)
牟伦扬	潘顺福、胡飞扬(46)
詹大权	钱雁宾(48)
孙超	童齐鸣(52)
冯适安	李道兰(54)
贺炳炎	方城(57)
方复生	张建成、李道兰(65)
张蒲	曹庆玉(68)
王正谦	施从发、张家龙(72)

漆先庭	方修胜 (74)
包惠僧	包东成、王恩炳 (78)
李 实	李道兰 (82)
 陈连升	姚本志等 (86)
吴禄贞	吴协生 (88)
万廷献	省政协文史办 (93)
聂国青	傅献瑞、武身龙 (95)
陶德瑶	李道兰 (98)
朱和中	吴仙河 (100)
彭汉遗	董 品 (102)
金华裘	崇阳县志办 (104)
左南屏	李安善、胡宝远 (107)
甘绩熙	张明达、刘湘松 (109)
邓玉麟	沈阳 (111)
张伯烈	戴祥成、曹付俊 (114)
贺有年	王恩炳 (117)
辜达岸	刘厚中 (120)
胡慎仪	胡远怀 (123)
卫挺生	杜清道 (127)
 张荆野	林 泉 (129)
田昊焰	邹昌盛 (131)
刘树杞	刘人哲 (133)
贺良朴	林 凡 (136)
闻一多	汪百川 (137)
陈曾寿	周君连 (143)

- 艾伟 江陵县教育志办(146)
舒文博 崇阳县志办、省《地质矿产志》办(149)
黄文弼 烈白(153)
熊十力 万学华(157)
余上沅 江陵县教育志办(161)
李济 吕英杰(165)
韩明炬 苏以翔(169)
黄松龄 石首县志办(172)
邓初民 石首县志办(179)
- 石凤翔 蒋乃辅、张祥麟(185)
慈舟 万松亭(188)
刘劲 董品(190)
查子香 吕尚(194)
许金门 朱冬石(196)

刘子通

刘子通（1885—1924），原名刘子栋，又名刘通，湖北省黄冈县刘树湾（亦名刘书湾）人，是我党早期优秀党员、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之一。幼时在乡入塾，聪颖勤学，深受老师喜爱。一九〇五年，去日本留学，攻读心理学。

留日期间，适逢孙中山与黄兴在日组建革命团体——同盟会。刘即首批加入，共谋反清。一九〇八年，他学业期满归国，就职成都铁道学堂教习，为“学运”领袖。一九一〇年十月，因积极组织学生请愿，向当局提出：“早开国会，总督代奏，一律罢课，不达到目的，誓不罢休”的要求，受到四川总督赵尔巽的明令缉拿，不能立足，化装逃回湖北。返鄂后，与革命党人迅速取得联系，寄居武汉，继续从事推翻清廷统治的革命活动。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首义成功。十六日，刘子通衔革命军政府之命，不避艰险，秘密潜回黄州，组织城内革命人士内应，策动清政府黄州营防驻军哗变，一举驱逐知府琦璋和黄冈县知县潘涌捷，光复黄州，革命军政府以其功勋卓著，授封黄州府督政务科长兼交际，督理日常事务。后目睹首义失败，革命成果尽被篡夺，军阀混战迭起，思想十分苦闷。一九一七年弃职，转赴河南教育厅工作，力图“教育救国”。

一九一八年，祖父病逝，回家奔丧，复往汉，先后在湖北省第一师范、武昌中华大学、私立武汉中学任教，遂同董必武、陈潭秋、恽代英等湖北早期共产党人结识，志趣相投，交往日密，政治上渐趋倾向马克思主义，接受共产主义思想，以为“非革命不能救国”。

一九二一年三月，参加由中共武汉支部发起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始系统研读马列著作，并常同该会会员在武汉中学聚会，交流学习体会，纵论苏俄十月革命经验，探讨救国出路。不久，加入共产党武汉支部，与黄负生等一起创办《武汉星期评论》。

同年夏，刘子通邀李大钊来汉讲学，教授唯物史观，宣传马列主义，影响极大。月余后，受聘湖北省女子师范学校，教授国文。其时，湖北全省封建势力统治极严，尤对妇女，禁锢很多。女师乃全省唯一女子学校，为经心书院的封建学究所把持，封建礼教，更形猖獗，有“顽固堡垒”之称。以校长王式玉为首的多数教师，均系以封建卫道者自居的老秀才、老举人，对“五四”运动后兴起的新思想、新文化，俱持敌视态度，而以培养“贤妻良母”为宗旨，竭力向学生灌输“三从四德”一类陈腐货色，政治、国事，则一概不准过问。刘子通与嗣后来校的陈潭秋、黄负生等，以该校为据点，进行党的秘密活动。他们利用教师之合法身份，广泛接触青年学生，传播革命火种，发展党、团组织。刘子通首破女师学生只习古文、文言文的旧传统，以白话文授课。遇有机会，即向学生讲解苏俄十月革命和妇女解放等革命道理，实施启蒙教育，使其认清妇女遭受压迫、帝国主义列强欺侮中国的根源。并在学生中发起妇女读书会，学习《共产党宣言》、《工钱劳动与资本》及《共产党》、《新青年》等革命刊物，启迪她们提高阶级觉悟，走争取自由解放之路，一扫女师昔日沉闷抑郁空气，代之以新鲜活泼景象，开湖北教育界一代新风。学生们受此鼓动，激情勃发，群起要求开放女禁，改革教育，学潮始发。十二月，刘子通在《武汉星期评论》上，公开发表《我们应有最低限度的三种觉悟》和《改良湖北教育意见书》等文章，大声疾呼：“当此学术革新之世”，“身负教育之重责”，决不可“麻木不仁”，“把那些陈腐教条当作金科玉律”，“杀人子女”；必具

备“丰富的学识，巧妙的教法或训练法，人格的示范”三种要素，“陶育人才”，“教育后进”。倡导改造社会，革新教育，对当时“部章规定之无当，吾鄂负教育之责者，因陋苟安，太不思改良，以应环境之需求”的教育现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与无情的鞭挞，进一步推动了女师学潮的爆发，培养了如徐全直、钱瑛、陈慕兰、夏之栩、袁溥之等一大批妇女运动骨干。反动校长王式玉视“学潮”如“洪水猛兽”，认为煽动学生闹事系刘子通等人所为，乃绞尽脑汁对抗。经密谋策划，遂以召集教职员会议为名，诬刘与学生之进步要求为“过激行动”，冀图采取高压手段，强行“矫正”。一班喽罗也趁机叫嚣要“整顿校风”。刘子通毫不畏惧，当场愤然驳斥：“学校之主体是学生，学生的合理要求，校方理应多加考虑，教学方式、管理办法，均应逐渐改进，以提高教学质量。若置学生正当要求而不顾，用强制手段对付，才真正会酿成学潮”。与王式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王式玉恼羞成怒，伺机报复。一九二二年二月新学期开始时，即突然以宣传“赤化”，“煽动学潮”的罪名，宣布解聘刘子通，妄图将学潮镇压下去。不料此举未能奏效，相反却更加激怒了学生，学潮愈闹越大。为反对解聘，女师学生在陈潭秋等同志的发动与领导下，迅即举行罢课，掀起了一场持续近五个月之久的斗争。王式玉及其亲信岌岌可危，乃又勾结省教育厅，上书湖北督军肖耀南：“仇父诽孝之言，忍心倡导；均产公妻之说，信口訾谈”，对刘子通横加诬陷，滥施攻击，并悬榜通缉。不得已，刘即忍愤离鄂北上，经李大钊介绍，在北京教育部谋事栖身。一九二三年，因积劳成疾，眷念家乡，由人护送回黄冈老家治病。次年三月病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历史研究所资料记载，当时曾有“南陈（独秀）北李（大钊）中刘（子通）”之称。

（黄冈县编史修志办公室 张双勤、董子儒）

材料来源：

1. 关于革命先烈刘子通有关情况的调查报告
2. 郭沫若著：《少年时代》
3. 刘叔真、刘恒敏、赵福容、龙子明、刘竹申、刘桂喜、张思文、夏之栩回忆材料
4. 黄冈简志
5. 烈士遗著：《改良湖北教育意见书》、《我们应有最低限度的三种觉悟》

昌绍先

昌绍先（1907——1928），河南省沁阳县人。生于富农家庭，七岁读私塾，十岁随叔父昌石麟到北京读书。一九二四年考入北京外语专科学校学习法文，同时利用课余时间到北京大学旁听。法文较好，能讲法语。昌绍先在北大听过李大钊讲课，开始接受马列主义。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发生，他在北京参加了反帝爱国的学生运动。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李大钊也派大批共产党员到西北军工作，协助冯玉祥创办西北军陆军干部学校。七月，昌绍先赴张家口，考入西北陆军干部学校。临行前赋诗一首：“男儿壮志出都门，英夷不灭誓不还。横尸疆场群英悲，为国流血最荣光。”

一九二六年，绍先在西北陆军干部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分配到西北军骑兵第五师做政治工作。“四·一二”事变后，冯玉祥与蒋介石勾结，驱逐全军的政工人员，昌绍先、谢甫生等奉党指示，潜伏下来，打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东路军总司令部当参谋。总司令鹿钟麟见绍先年轻英俊，擅长演说，很有才华，又懂法文，对他极为器重，常带身边活动，为他开展地下活动创造了条件。南昌起义后，河南省委通知昌绍先、谢甫生（原名谢祥荫）等随南汉宸到皖北太和驻防的杨虎城部开展党的工作。是年初冬，南汉宸、昌绍先、谢甫生等从开封到皖北阜阳、太和等地，与党组织负责人魏野畴接上关系。魏野畴根据上级党的指示，多次与杨虎城将军谈心，杨表示愿与共产党继续合作。为了逐步改造杨虎城部，魏野畴和南汉宸、昌绍先等商量，决定创办军事学校，为革命培养军事骨干力量。经杨虎城同意，抽调了一些进步的青年军官，招收了一批革命知识分子青年共

四百余人，其中有共产党员一百一十多人，在太和县开办了政治军事学校，南汉宸任校长，昌绍先任第一队队长，谢甫生任第二队队长。

一九二八年一月，蒋介石派韩振声到杨虎城部逼杨“清党”，并要逮捕南汉宸、魏野畴等共产党员，杨被迫随韩去南京，尔后赴日考察。由孙蔚如代理军长，实行“清党”。南汉宸、魏野畴等离开了部队。由于形势急剧变化，魏野畴于二月九日夜在太和县城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建立皖北特委，魏野畴任特委书记，昌绍先等八人为特委委员。昌绍先负责领导兵运工作。他通过私人关系，打入高桂滋部教导二团，与地下党员杜聿德（杜聿明之弟）联系，秘密发展党组织，进行“策反”工作。不到一月，在十军内部发展地下党员二百八十多人，十九军教导二团九个连，都建立了党的组织，留守司令部特务连，也为昌绍先等所掌握。

三月二十五日，中央给皖北特委的来信指出：现在的策略是“发动群众斗争，领导群众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强调必须“给工农群众、党员以武装训练”，准备“工农武装暴动前的必要条件”。四月五日，魏野畴、昌绍先等在阜阳城贡院后街马昌实家召开特委扩大会议，制订了武装暴动计划。可是，在杨虎城部任党的地下军委代理书记的宋树勋反对起义，并叛变投敌，当晚就把起义计划和党员名单通过太和县长李天午转告代理军长孙蔚如。四月六日，孙蔚如集合军校学员，收缴武器，把一百三十多名党员押送出境，驱逐出皖北。四月七日晚，魏野畴、昌绍先、杜聿德、李湍甫、胡英初等二十人，在阜阳西湖“会老堂”举行地方党委负责人联席会议，决定发起以高部起义队伍为主力，工人、学生响应，农民赤卫队配合的阜阳武装暴动。会后成立了军事委员会，魏野畴为武装起义总指挥，昌绍先、杜聿德两人领导教导团起义部队攻城。

四月九日凌晨，大雨阵阵，枪声响彻漆黑的夜空，昌绍先率

领教导团的起义军首先发难，打死反动连长苗震飞，占领了东门。继而其他各部纷纷发动。但因雨夜联系不周，情况不明，战事不利。至黎明时，敌教导一团梁文铁部将城门紧闭，向起义军反扑，城西之敌设伏相待，加上大雨磅礴，起义部队在城内失去联系，城外农民暴动队亦未能赶到。为了摆脱敌人，魏野畴、昌绍先等改变攻城计划，将起义的五个半连分两路向外界转移：一路由昌绍先、杜聿德率领三百五十余人渡颍河，向阜阳以北三十里的行流集、王官集方向挺进；一路由魏野畴、胡景陶（后脱党叛变）率领二百人前往阜阳以西的老集一带发展力量，接应行流集、王官集部队。野畴率部冲出阜阳西郊敌人的伏击圈，向西区迂回转移。九日清晨遭国民军第二十军收编的土匪部队和地主武装“红学会”的截击，由于叛徒与敌军勾结，魏野畴等被捕，当晚被害。

昌绍先、杜聿德等率领起义部队于九日上午到达王官集，数千名群众夹道欢迎，起义部队和农民武装会师。当天下午，在王官集大寺庙前召开了有两万多人参加的皖北工农兵起义大会，正式宣布成立皖北苏维埃政府和皖北工农红军。大会通过了事前由野畴主持起草的《农民协会组织章程》、《临时土地法》和《临时工会法》等三个文件。选举李瑞甫、李烈飞为皖北苏维埃政府正副主席，昌绍先、杜聿德为皖北工农红军正副总指挥。大会后一、两天内，斗争了周围二十里的大地主和土豪劣绅二十余户，将财物、粮食分给了贫苦农民，收缴地主短枪六十余支，红军很快扩充到一个团，农民赤卫队也发展到近万人。十一日晨，敌高桂滋部加上阜阳地方反动武装共二千余人，对王官集地区实行包围进攻。昌绍先指挥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奋起反抗，激战三、四个小时，终因敌众我寡，弹尽援绝，被敌打散。昌绍先为了保存革命种子，命令当地同志疏散隐蔽，外地同志由杜聿德、苗勃然二人率领突围。为了掩护同志突围，昌绍先中弹受伤。

李湍甫、李烈飞等要挟他一起突围，他说：“我是外地人，又身负重伤，不能连累你们，你们快突围吧！”他并指着西边说：“你们绕小道，过小桥，渡颍水，到河西，就可以隐蔽了，千万要保存革命种子！”李湍甫、李烈飞等含着热泪告别，率领部分同志在群众掩护下突围脱险。昌绍先壮烈阵亡，时年二十一岁。

“全国解放后，人民政府在安徽省太和县草寺集兴建了昌绍先等革命烈士纪念碑，在阜阳县建立了革命烈士纪念馆，在王官集建立了“四·九”暴动陈列室，参观者络绎不绝。一九七六年，昌绍先的老战友谢甫生（曾任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等职）接到绍先的哥哥（在四川工作）寄来绍先的诗稿和像片，遂题诗一首，以表哀思：

四十八年鏖战去，还来祖国万年春；
天府邮传思亲信，地下长眠忠烈魂。
巴山楚水明朗日，淮北颍川旧时云；
亡友事业未竟成，当幸还有接班人。

（注：此诗由谢甫生之子谢平生提供，谢平生系阜阳市志办吴德才同志整理）

本文资料来源：

- 1.《魏野畴传略、回忆、遗文》，陕西人民出版社。
- 2.安徽阜阳地区党史资料《阜阳“四·九”起义专刊》。
- 3.安徽省政府：昌绍先烈士档案资料。
- 4.访问谢甫生、刘占元等革命老人的笔录。
- 5.方罗来：《皖北阜阳暴动与皖北苏维埃斗争》初稿。

李兆龙

李兆龙(1898—1928)，字炳明，石首县调关班竹岭人。生于较为富裕的农民家庭。一九二二年毕业于武昌中华大学，一九二三年六月，到日本东京明治大学留学。留学期间由黄克谦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回国后，恽代英介绍他担任黄埔军官学校教官。

一九二六年七月间，北伐战争开始，李兆龙任北伐军宣传队队长。同年底，以湖北全省总工会特派员身份到黄石做工运工作。他多次发动大冶铁厂工人向资本家要求改善生活条件，增加工资，斗争先后取得了胜利。十一月，黄石港地委(后称港窑湖地委)成立。丛允中任书记，李兆龙任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兼军事部长。下旬，大冶总工会成立，李兆龙率领三十名铁厂工人砸了“工匠门”，贴出总工会布告：“废除工匠门，填平狗洞，工人进出自由，不准侮辱工人……。”厂方接受了总工会提出的保护工人利益的二十六项条件。一九二七年二月底，大冶总工会建立工人纠察队，李兆龙任该队的政委兼总指挥。工人纠察队成员有六百余，长短枪三百支左右。

“四·一二”蒋介石叛变后，李兆龙全面负责工农武装工作。他亲自主持召开总工会大会，提出“打倒蒋介石”、“我们要建立工农政府”的口号，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同年五月二十日，大冶总工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会上，李兆龙做了“政治问题”报告。五月十七日，夏斗寅师公开叛变。六月七日，叛军七千余人窜向大冶。丛允中、李兆龙和李实(地委委员)等召开地委紧急会议，决定依靠工农武装痛击夏部叛军。六月八日上午，叛军一小股窜扰大冶城关，一进城就疯狂屠杀农民自卫军，捣毁农

协，县农会的两名农民自卫军门岗被叛军用刺刀活活捅死。值此危急关头，丛允中、李兆龙和黎实三人在下陆匆促碰头，决定拆除部分铁路，阻止敌人前进，同时立即组织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进入战斗，阻击来犯的敌人。李兆龙率领工人纠察队火速赶往大冶城关，小股叛匪仓惶逃去。六月九日凌晨，叛军经下陆扑向石炭窑，在牛角山头与大冶工农武装交火。叛军据守中窑山头，由李兆龙和丛允中发动、组织的五百多名武装工农，带领着手执锄头、扁担、长矛和大刀的工农群众三万余人（另说一万多人、五百多条枪），据守在铁厂一门山头。叛军仗着武器精良，先后九次发起冲锋，都被击退。战斗持续到午后，工农武装的阵地，仍然寸土不让，而后叛军分兵包围，工农武装腹背受敌，加上有五百名工农战士牺牲，敌我力量的悬殊，不得已撤出了防线。

夏部叛军亦遭沉重打击，不敢在黄石久留，只呆了一天，但对工人纠察队表示出刻骨仇恨，他们一见到身穿蓝衣服（即工人纠察队穿蓝上衣）的人就杀。大冶铁厂二门外，一天中就被杀二百多人。六月十日，激斗的第三天，地委举行紧急会议，议决：恢复生产；镇压反革命；对从农村逃出的土豪，捉到一个枪毙一个。十一日，李兆龙率领工人纠察队到大冶镇压反革命，经过五天的整顿，使社会秩序恢复正常。

七月间，湖北省委紧急命令黄石港地委撤至九江待命。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数百人，加入北伐军第二十军贺龙的部队，不久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

李兆龙于七月底被调回武汉做秘密工作。

一九二七年底，上级党组织派李兆龙到石首任中心县委书记领导和发展工农武装。他托人捎信说服了父母，将家里的田地分给贫苦的农民；创建以小河、桃花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革命的势力还逐步扩及到附近的华容、监利各县。当时湘鄂边前委贺龙、周逸群根据中央建议，邀请李兆龙和石首中

心县委领导的农民武装，投入秋收和年关暴动，扩大工农革命军。李兆龙经过艰辛的工作，扩大了革命的武装。次年春，革命武装在战斗中活捉了团防局长，缴获了八十多支枪。

一九二八年四月，省委调李兆龙任江陵县委委员。一次，李随鄂西特委在沙市机关里讨论对敌作战计划时，被鄂中清乡司令部稽查大队侦知，率警围捕。关学圣（省委）、张计储、魏良生、张光杰（特委）和李兆龙、彭之任、邓振青（江陵县委）等同志均被捕。国民党当局严刑逼供，李兆龙等守口如瓶。不久，李兆龙被押至沙市拖船埠口杀害，悬首示众三天，时年仅三十一岁。

（湖北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夏福源、刘仲然）